

“中华魂”教育活动培训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优秀教师

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近日,全国“中华魂”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在京举办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优秀教师培训会。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开班式并讲话。教育部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姚喜双、北京发行集团等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。中国关工委办公室主任陈江旗主持会议。

顾秀莲指出,全国“中华魂”主题教育活动和关心下一代工作涌现出了一批富有时代特征、具有当地特色、符合青少年特点的读书活动工作品牌和亮点工作。老同志不顾年高、不辞辛劳,诠释了“忠诚敬业、关爱后代、务实创新、无私奉献”的“五老”精神。顾秀莲强调,要充分发挥五老优势和作用,在活动形式的创新上

下功夫,探索 and 把握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规律,使读书活动不断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青少年,教育引导青少年成长成才,听党话跟党走。要整合资源,联合宣传、文明办、教育、科技、政法等有关部门,勇于搭台唱戏、巧于借台唱戏、善于同台唱戏。姚喜双肯定“中华魂”主题教育活动带动了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的共同发展,形成了“三教”相互配合,形成了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育人环境。

“中华魂”主题教育活动始于1994年,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、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、人民出版社、人民教育出版社、北京发行集团等单位共同举办。主题教育活动以书为载体,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,实现读书育人、提高素质、励志强国的目标。活动至今已走过24个年头,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区,累计有3亿多次青少年参加并从中受益。

(思实)



宋丽汀

宋木文(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、国家版权局原局长),是我父亲的长兄,我的大伯父。大伯父逝世三周年了,却依稀仿佛昨日。

父辈们一共有七兄妹,加上我们这代以及下一代,甚至下下代,可谓是一个大家族。大伯父85岁那年,家里人组织了一次回乡祭祖的活动,参与人员浩浩荡荡。

其实那个“乡”对我而言是遥远而陌生的,但一路上听着父辈们的故事,心情竟也激动和澎湃起来。追忆过往,那个年代的人所吃的苦和受的罪,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想象和承受的。在艰苦的岁月里,大伯父除了帮助父母干农活,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,还要坚持每天来回走40多里路去上学。大伯父各学科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,被同学称为“宋代表”,19岁那年被派往东北大学学习,这在当时当地绝对是个不同凡响的消息。在大学期间,被组织上批准秘密入党(当时东北大学党组织尚未公开)。后来大伯父外出工作,据说有十几年未曾回家,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感人的情节。

那是在1959年的夏天,30岁的大伯父陪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和教育司司

长王子成到东北三省做调研,工作之余,他一路打探,朝着吉林市郊区——家的方向走,希望能回家看上一眼。十年的时间,家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当他走到村口,看见一位大娘在田里干活,便上前问路说:“这位大娘您好,请问老宋家怎么走啊?”大娘惊奇地问:“你是?”“我是他家的老大,我叫宋木文。”“哎呀,儿子啊,我是你妈妈呀!”大伯父定睛一看,这正是自己的老母亲啊,母子二人,悲喜交加,随即相拥而泣。十多年未相见的母子,已经快认不出对方了。

大伯父很喜欢一家人四世同堂的生活,大伯父的父亲(我的爷爷)去世早,他作为家中长子,一直承担着抚养老母亲(我的奶奶)的责任,对其非常孝顺,直到我奶奶生命的最后时刻。他还一直保留着我奶奶亲手为他缝制的沙发布垫,时常拿出来看看,与亲朋好友分享这份爱与思念。长兄如父,大伯父对六个弟弟妹妹也非常关爱,但却从不允许他们利用他的职位做“出格”的事情。我的一位堂哥,也是大伯父的侄子,是位腿部有残疾的有志青年,自力更生,开了个小书亭。大伯父非常支持,并嘱咐他:“宁可不要赚钱,也不要卖非法出版物,生活有困难我帮助。”甚至当堂哥作为“自强模范”得到中国残联全国表彰奖励后,大伯父就是不让他上原新闻出版署的“光荣榜”,以避嫌。

大伯父自称“三无”干部:一无大学毕业文凭,因工作需要,大学没有读完;二无高级专业职称,尽管担任编辑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,但自己没有专业职称头衔;三无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担任署领导期间,给王益、王子野等老出版家申办了政府特殊津贴,但拒绝给自己搞政府

特殊津贴。

大伯父非常重视人才,尤其关心和爱护年轻干部,在他新任署长时,主动提出继续留用上一届署长的秘书作为他的秘书。要知道,在一个机关里,前后两任主要领导同志同用一个秘书,是极为少见的。我猜想,他这样做除了是关心和爱护年轻干部,也是唯才是举,用人不疑的表现吧。

大伯父从原新闻出版署的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以后,婉拒了很多社会职务,却一直热心支持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,用他自己的话是“为文化传承张罗几套大书”。张罗的几套大书有《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》《续修四库全书》《中国图书大辞典》,影印天津阁本《四库全书》,重辑出版佛学经典《嘉兴藏》。另外,离任后他笔耕不辍,接连出版了《宋木文出版文集》《亲历出版三十年——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》《八十后出版文存》《思念与思考》《一个“出版官”的自述——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》等著作,系统回顾了其所经历的中国出版业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,为出版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,也作出了生命不息、学习和工作不止的表率。他的文章都由自己书写,内容平实而深刻,简约而丰富,没有空话套话,以自己的语言分析和探讨问题,凸显其为人做事的风格和特点。而这些“退而不休”的做法恰恰映衬了他自己的那句话:“做个快乐健康而有所作为的老头儿”。

大伯父一直坚持参加出版相关活动,最后一次参加出版活动是在其临终前三个月,其实在那期间他已经和家人说起觉得身体虚弱无力。会上他被安排第一个发言,讲了半个小时,按理他是可以在结束发言后离开会场休息的,可他仍然坐

在那细心听他人的发言,和大家一起足足坐了四个小时,与会人员无不为之感动。会后不到半个月,他就病倒被送进医院抢救室了。

大伯父非常热爱他的工作,把整个人生都献给了出版事业,他曾说:“我以出版人作为我的人生定位,自勉‘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’,且行且思。伴随人生定位,始终在思念思考”。他还说:“我做出版,是把它当作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,并逐渐把个人追求与职责承担结合起来。离开了岗位,而事业还牵挂着。”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,依然满心牵挂,心里想的,手头做的,几乎都是出版工作。他请相关人士前来,一件一件,细细嘱托,说的都是关于出版的一些人和事,无一件是私事。

大伯父为人和善,平易近人,他曾说:“人的一生,要多交一些朋友为好。以诚相待,可以增添友情;心怀坦荡,必会相遇知己。多为朋友着想,做事不求回报,但求理解与知心,这样才能活得安心与顺心”。很多工作上的下属和同事都视他为良师益友,甚至最后都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所以才有了后来在八宝山追思会上,我们并不觉得诧异看到了那难以抑制的,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般悲痛的情形。

著名作家王蒙曾这样准确而有深度地总结了大伯父的为人:“他是一个正派的人、深思的人、负责的人、善意的人。水平不在高调,文采不在言说,友谊不在拉扯,交流不在频率。在淡如水的来往中我体会也感受到他的炽热的心。他走了,他的良好品德、忠诚形象与高尚人格永生。多么希望党内多一些这样的好同志啊!”我深深地被这段淡水浓情的肺腑之言感动着。

大伯父在出版界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,他离世后,来自出版界众多大咖的好评如潮,我最喜欢的是这段描述:“他正直、朴实、敏锐,有智慧,敢担当,不要阴谋,不喜欢圆滑。他非常谦和、非常虚心,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,静静地聆听别人的意见……他不像白云那样飘得很远很远,因为他像一道奇特的风景,永远耸立在你身边!”这段话把大伯父的良好人品描述得如此贴切,可以让词穷的我能用这些词句记住和怀念他而感到释然与欣慰。

在大伯父去世前那年的春节(2015年2月)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,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到家中看望大伯父。大伯父一生在工作上尽职尽责,得到了肯定,我想,他离开时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。

最后一次与大伯父见面是在他去世前半年,临别时他一如既往地站在门口,用温暖慈爱的神情目送着我们。我牵着年幼儿子的手,前行又回头。现在回想起当时不舍与不忍的心情,或许已经暗示了,那次说的再见,其实是永别。而当时若是知道了那次的回眸将是我们今生最后的对视,我们又怎会告别得如此简单而匆忙?

2016年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《永恒的记忆:宋木文同志纪念文集》一书,这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我总是希望并愿意相信,这世上的人死后,会去另一个地方,我们称那里为天堂。这样,失去亲朋的人就可以不用那么悲伤,可以带着希望,多些坚强。

人走了,才有感于相聚的时间太少。些许遗憾,更添思念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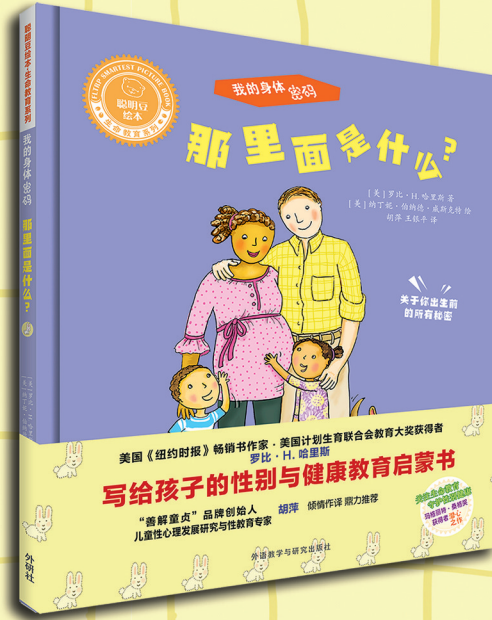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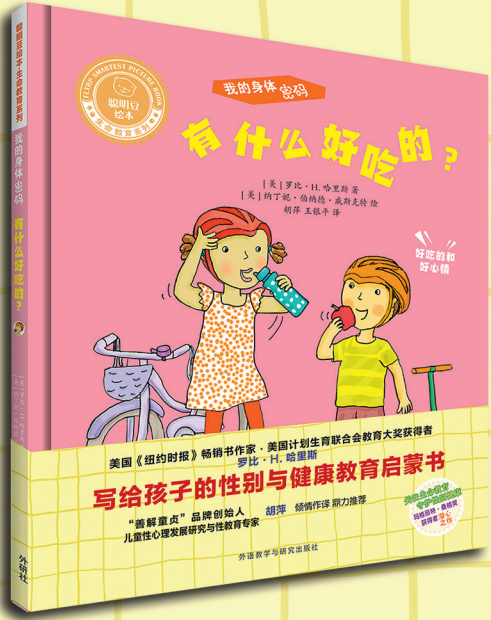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为宋木文同志的侄女)

聪明豆绘本·生命教育系列

我的身体密码

写给孩子的性别与健康教育启蒙书

儿童性心理发展
研究与性教育专家
胡萍
鼎力推荐



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热销书作家
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教育大奖获得者
罗比·H.哈里斯

